

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八首白话诗被视为中国新诗的起点,不少学者认为——

一百年前,是“翻译”为新诗打开局面

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八首白话诗,被视为中国新诗的起点。其后,闻一多、戴望舒、徐志摩等一批杰出诗人迅速涌现,象征主义、新格律诗等流派百花齐放。崭新的形式与多元的表达,让新诗如同那首著名的译诗《关不住了》一样,从固定的文学版图中破土而出,散发蓬勃的生机。而这其中,我们总能看见翻译诗歌“如影随形”的身影。

今天,我们回溯新诗百年的脉络,不妨换一个入口,看看诗歌翻译,对于当年新诗摆脱质疑、探索出路和不断丰富壮大,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嘉宾：熊辉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采访：钱好

本报记者

►冯雪峰借翻译高尔基成就了中国的“海燕”,李金发借翻译魏尔伦成就了东方的“微雨”,翻译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图为美术作品《海燕浪花共舞曲》。



在新诗创作举步维艰的情况下,译诗为中国社会和文学引入“新声”

记者：今年是新诗诞生100年。我们知道,在这100年里,新诗的发展始终和诗歌翻译有着密切的关系。能不能先介绍一下,在新诗被称为白话诗的最开始,它与诗歌翻译有着怎样的关系?当时文学界主要受国外什么流派、风格诗歌的影响?

熊辉：早期白话诗与诗歌翻译的关系极其复杂。从创作资源的角度来讲,五四前后的译诗在诗体形式、音乐性、情感和思想等方面,都堪称新诗的榜样,几乎所有的新诗创作都留有译诗影响的痕迹。就构成要素而论,译诗成为最早践行新诗观念的作品,在新诗创作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率先展示出白话诗的体例。比如胡适翻译的《老洛伯》已非清末旧体,实乃成熟的白话新诗,也难怪他要以《关不住了》这首译诗来标举新诗的纪元。

早期新诗界对外国诗歌流派和风格的接受并非井然有序。我们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将西方纵向发展了上千年的诗歌引入中国,然后在一个横向的空间里对之加以吸收,乱象丛生自是无可避免。不过,在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那些富于变革精神的诗歌更易于受到国人的青睐,比如浪漫主义诗人彭斯、华兹华斯、柯列律治、拜伦、雪莱等人的作品,美国新诗派运动的将蒂斯代尔、洛威尔等人的诗歌,构成了五四前后译诗界的主色调。这在无形中契合了鲁迅1907年撰写的《摩罗诗力说》之旨要,即大力推介富有“革命”气质的诗人诗作,为中国社会和文学引入“新声”。

记者：在那以后,中国新诗又是怎样在传统的古体诗和新涌入的国外诗歌之间找到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中译诗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熊辉：事实上,新诗的写作资源至少包括四个方面:中国古典诗歌、外国诗歌及其翻译体、民歌以及自身逐渐积淀起来的传统。正是这四个方面的合力,共同促成了今天新诗的创作局面。

古典诗歌对新诗的影响自不待言。作为中国人,传统诗歌早已成为我们文化基因的构成要素,不管早期新诗如何拒绝传统,如何不顾一切地拥抱西方,却始终不能将之化为云烟。比如小诗潮的兴起,看似受了日本俳句和泰戈尔短诗的影响,实际上却是人们对绝句体的回溯;比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晚唐诗风的盛行,产生了戴望舒《雨巷》一类唯美的诗篇,多少透露出人们对古诗风韵的留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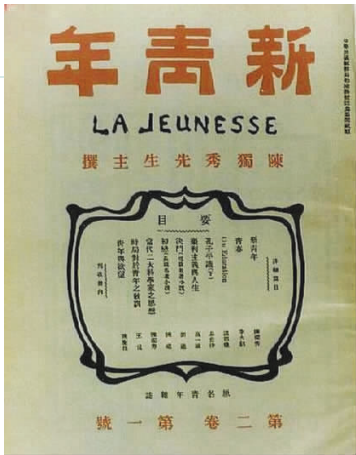
但与此同时,没有翻译诗歌,中国新诗能否取得今天的成就,也要打个问号。很多诗人和学者在论述新诗发生发展的机缘时,纷纷将眼光投向了域外,比如曹顺庆就说新文学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长的靠着汲取外来营养发育的新品种;梁实秋甚至说“新诗就是用中文写的外国诗”,此话虽显极端,却并非无理。在新诗确立文体地位的过程中,翻译诗歌真可谓功不可没。首先,它让大多数中国人有了接触外国诗歌的机会,让新诗创作资源更为丰富;其次,它让新诗人的创作有了可凭附的模板,诗体解放

和创新得以实现。胡适认为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新诗是其翻译的蒂斯代尔作品,冰心等人的小诗创作受惠于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诗篇,散文诗的产生与刘半农翻译屠格涅夫直接相关,闻一多等人的新诗创格离不开英语诗歌的节奏。中国现代诗歌的主要流派与西方诗歌之间也能找到对应的关系,正如刘重德先生在《文学翻译十讲》中所述:“五四运动产生了许多诗歌流派,比如浪漫主义诗派(郭沫若),大众化诗派(刘半农),小诗派(谢冰心),湖畔诗派(冯雪峰),新古典主义诗派(冯至),新格律诗派(闻一多),革命诗派(蒋光慈),象征主义诗派(戴望舒)。总之,这些诗派和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外国诗歌(包括东方和西方的诗歌)的启示和影响。”浪漫主义诗歌的兴起与郭沫若对雪莱诗歌钟情有关;大众化诗歌的时兴多少与刘半农对爱尔兰和印度“拟曲”的翻译分不开;象征主义诗歌的出现,始于李金发对魏尔伦的师从,成熟于《现代》和《新诗》两杂志的作家群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派作品的译介。如此等等,当能说明翻译诗歌对百年新诗发展的积极作用。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翻译诗歌给中国新诗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小觑,语言欧化导致母语诗性的降低,形式松散导致新诗创格举步维艰,翻译体在有损原作艺术形象的同时左右了中国新诗在形式上的自由化潮流,这些都业已成为百年新诗发展的顽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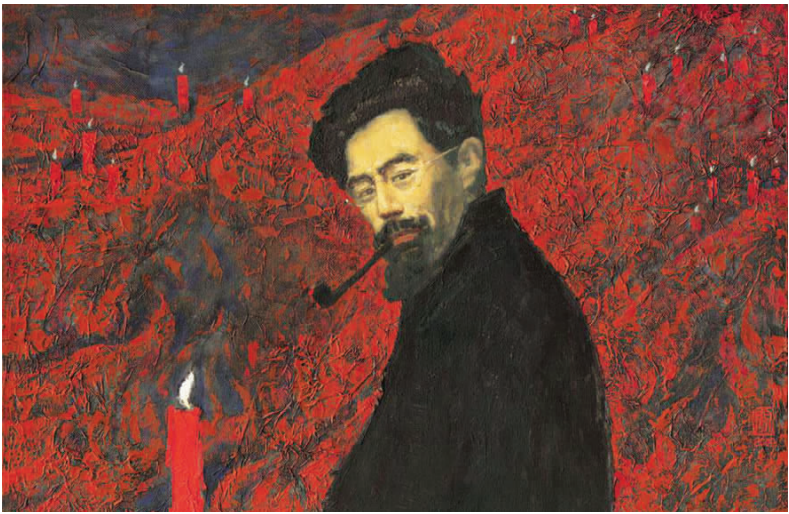


▲1924年泰戈尔访华,由林徽因和徐志摩作陪,三人留下了这张合影。



▲《新青年》杂志(左图)是中国新诗发端的阵地。冰心的小诗派创作与地翻译泰戈尔的诗作分不开,右图为冰心翻译的泰戈尔诗集《吉檀迦利》。

▼闻一多常常将诗歌翻译融入自己的创作中,著名的《忘掉她》就有对外国诗歌的翻译和借鉴。图为闻一多之子闻立鹏为父亲创作的油画《红烛颂》。



中说,何其芳“在译诗上试图实践他的格律诗主张”,这个评价是有据可循的。

除了借助翻译来检验创作理念之外,文学家们也尝试借助翻译来表达个人情感。在此方面,胡适似乎仍是先行者。胡适很少创作爱情诗,但他的译诗却有很多是爱情诗,他的创作与翻译主题呈现出矛盾的关系。但细思却又十分合理,传统礼仪限制了胡适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却无法阻止他内心的对真情的渴望,因此翻译弥补并表达了他的情感。闻一多也算是这方面的典型,除借助翻译美国诗人米蕾的十四行诗创造了《死水》外,其另一名篇《忘掉她》同样是借翻译抒

旧文新读

吉檀迦利(节选)

【印】泰戈尔
冰心译

你已经使我永生,这样做是你的欢乐。这脆薄的杯儿,你不断地把它倒空,又不断地以新生命来充满。

这小小的苇笛,你携带着它逾山越谷,从笛管里吹出永新的音乐。在你双手的不朽的按抚下,我的小小的心,消融在无边快乐之中,发出不可言说的词调。

你的无穷的赐予只倾入我小小的手里。时代过去了,你还在倾注,而我的手里还有余量待充满。

当你命令我歌唱的时候,我的心似乎要因着骄傲而炸裂,我仰望着你的脸,眼泪涌上我的眶里。我生命中一切的凝固与矛盾融化成一片甜美的谐音——我的赞颂像一只欢乐的鸟,振翼飞越海洋。

我知道你欢喜我的歌唱。我知道只因为我是个歌者,才能走到你的面前。

我用我的歌曲的远伸的翅梢,触到了你的双脚,那是我从来不敢想望触到的。

在歌唱中的陶醉,我忘了自己,你本是我的主人,我却称你为朋友。

秋日

【奥】里尔克
冯至译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

把你的阴影落在日规上,让秋风刮过田野。

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迫使它们成熟,把最后的甘甜融入浓酒。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在林荫道上来回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关不住了

【美】萨拉·蒂斯代尔
胡适译

我说:“我把我的心收起,像人家把门关了,叫爱情生生的饿死,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但是五月的湿风,时时从那屋顶上吹来;还有那街心的琴调一阵阵的飞来。

一屋里都是大阳光,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他说:“我是关不住的,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